尚和合 中华心 民族魂

冯鹏志

和合理念是中华文明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先人曾以乐音和谐，来象征和瞩望宇宙与社会的和合存在，以“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天才思想，从世界观和价值观上来表达对多样性、差别性及其内涵的普遍性的肯定。数千年来，对和合理念的崇尚，推动和支撑了中华文明的生成、延续和发展，也必将在一个新的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和智慧。

和合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和合二字很早就在甲骨和金文中反复出现。在中华文化的典籍中，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先秦的《国语·郑语》，周王室太史伯对话郑桓公：“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是和合二字的最早联用，也是和合理念的最初表达。在同一段对话中，史伯明确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中首次确立了和合理念的原生性、基础性地位。

《左传》也记载了春秋后期齐相晏子关于“和”的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xī）醢（hǎi）盐梅以烹鱼肉，祗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是在孔子之前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崇尚多样性的辩证思维的代表。其后，孔子在《论语》中不仅将上述思想总结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人文分类系统，更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阐述，把“和”的理念明确为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孔子的孙子子思则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平衡与和谐的意义从人类推及宇宙，让和合理念进一步成为中华文明独到的关联思维和价值理想。

和合理念的历史实践

自汉代以降，伴随着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实体和精神上的不断生成壮大，和合理念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和文明发展中逐渐展开，成为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实践准则和卓越智慧。

在文明实践的层面，自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长期的分裂，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保证了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由郡县制支撑的统一的国家。虽然后来也出现过短暂的分裂或不同的民族政权，但统一的中国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展现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也证明和合理念在维系中华文明变迁演进中不至于中断碎裂的重要历史价值。

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看，和合理念转化为“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自然观与世界观；从人与社会关系的维度看，它转化为“和为贵”观念，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族群融合和社会建构的重要原则；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它转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成为中国人规范自身行为与价值取向的伦理原则；从人与心灵关系的维度看，它转化为“正心诚意”观念，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底蕴；从文明与文明关系的维度看，它转化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观念，成为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

在不同文明和国家的交往实践中，中华民族创设的朝贡体系历经先秦的肇始、秦汉的发展、唐宋的兴盛和明清的巅峰，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乃至近代，长期成为东亚、“丝绸之路”沿线乃至更广阔区域不同文化、族群和宗教实现和平交往的基本模式。相对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文明交往秩序及其征伐恩怨来说，秉持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理念的中华朝贡体系，无疑是近代以前漫长历史中更为和平而理性的秩序建构。

总的来看，和合理念以中华先民的原初智慧为起点，在中华民族不断融合不同文明和多元宗教的历史进程中展开，追求以和谐为导向的多样性共存互补，它不但是中华文明长久以来处理不同文化、宗教、地域、国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源，也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连续性文化实践。

和合理念的当代意义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大踏步迈向民族复兴，古老而常新的和合理念彰显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要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表达了中国道路的文明追求，也彰显了和合理念的当代意义。

一，坚持“和而不同”的文明发展立场。“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人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确立起来的伟大智慧，其最深刻的含义和启发，就是要立足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水平，既保持与整个世界的协调性与建设性，又坚守中国作为中国道路建设和评价主体的独立性与个性。

二，坚持“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目标。合作共赢不仅是和合理念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中国道路对全球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独特贡献。随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核心的中国梦及其世界理想的提出，和合理念将引领中华文明的复兴，也将更深刻地开启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进程。

三，坚持“互学互鉴”的文明发展模式。坚持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发展模式，也是和合理念赋予中国道路的根本品质。伴随着中国道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和合理念必将为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世界秩序建构，提供具有历史合理性和世界广阔性的文化选择。

四，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价值理想。面对人类探索更合理世界秩序的时代要求，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不仅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也是和合理念的新内涵和新使命。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 历史名人的家训

严复——旧说不叛，群念勿轻

吴四伍

一叶知秋。要在苦难的中华民族近代奋斗历程中，寻找极富代表性的个体标本，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的变迁，严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学贯中西的严复，在家风传承、家庭教育中，也留下了诸多真知灼见，但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值得特别一说。

珍视传统，旧说不叛。“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1921年10月3日，饱受肺病折磨的严复在弥留之际，如此郑重交代儿女。这是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世人皆知，严复重视西学，重视西方文化。学习西方，从最初的学习坚船利炮，到后来的制度技术，最后到文化价值等，严复正是各种运动的产物。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学生，严复在学习西方的枪炮方面，可谓身体力行。他先后在北洋舰队的扬武轮船上实习，在天津的东制造局讲学，最后投身于教育，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西方文化。

严复对于西方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对西方的认同不可谓不全面。但是，难得的是，严复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旧说”的态度，是可以扬弃，但不能背叛。在严复的内心深处，中国的富强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的文化是药，是花，但不是根，不是果。这样的见识，自是他多年精思熟虑的结果。1888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告诫严复，海军只不过是国家建设大树上的花朵，最重要的是建设国家的根本。30余年后，严复对此念念不完，以译书立说代替了学习坚船利炮。从文化上追求中国的富强，矢志学习西方，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而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背叛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才是严复最深切的关怀，是对儿女的厚望，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期待。

珍惜身体，健康快乐。在1921年的遗嘱中，严复告诫子女：“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务。”重视身体，讲究卫生，相信科学，是严复超越时人的重要见识。他苦口婆心告诫三儿：“只要身体强健，其余皆可置为徐图，儿须深察。此言不可当作东风吹马耳也。”他告诫外甥女，不可嗜爽好之食，不可从目前之欲，应该讲求卫生之道，不能一味依赖药物。严复尤其重视男女平等、心理健康。1907年，他在高等学堂任考官，有一名王姓学生，论文谴责古代“杀妾饗军”现象，提倡男女并重。严复对此大加赞赏，不仅将文章列为优等，还自己赏给他十元钱，感叹没有合适的女儿，否则招其为女婿。严复对于自己的家庭之乐，也十分重视。

珍爱自由，群念为重。严复珍视个体自由，翻译《群学肄言》，倡议男女平等；但又重视集体，认为国家重于个人。他宣称：“身为国民，国第一，而一切事皆其次。此今日五洲之通义也。”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他告诫子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尽管崇尚西方的契约精神、自由理念，但是他深层认定，近代中国的富强，需要集体主义的倡导。

时逢三千年之大变局，终身矢志传播西方文化，严复堪称近代西方思想东传的盗火者。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标示性人物，他笃信西学，认为西方的文化与知识是真正的事业，却又热爱中华文化传统，希望以西学为手段，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现中华文化的近代创造性转换。严复一直生活在这种爱与信的矛盾之间，他一方面相信引进西方知识的必要与紧迫，另一方面他又坚信中华文化的优秀与传承，他坚持传统为先，坚持集体为上，都是如此的种种表现。与其说是严复的人格分裂，不如说是整个时代的撕裂。渴望中西互补、中西贯通，自是严复家风的重要特征，珍视自由又坚守传统，珍爱个体又尊重集体却是其基本底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 汉字故事

扬州瘦西湖徐园门额——“徐園”中藏有一只虎？

杨立新

扬州瘦西湖是我国著名的湖上园林，沿着600米的长堤春柳迤逦而行，尽头便是徐园。

徐园原为大军阀徐宝山的祠堂。徐宝山早年为拥有数万党徒的大盐枭，人送浑名“徐老虎”。辛亥革命时他加入革命党，曾率军光复扬州、泰州等地，官至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后叛变拥袁。1913年5月，革命党人陈其美派人以送古瓷瓶为诱饵，将其炸死。

徐园之门，形如满月。门额上镌有“徐園（园）”字，字径逾尺，笔力遒劲，堪称神品妙构。

“徐園”门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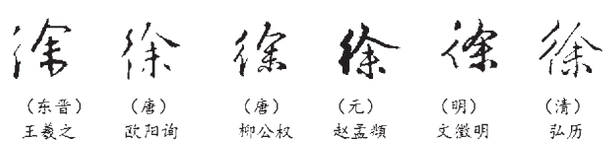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徐園”二字并非同一字体，“徐”字为行书，工稳而苍劲；“園”字为草书，虬曲而飞动。只是旁边落款有如天书符箓，不知出自何人手笔。

导游介绍说，“徐園”是清末民初扬州籍书法家、人称风先生的吉亮工所书。说起风先生为徐园题字，还有一段蛮有趣儿的故事呢。

据说大军阀徐宝山非常喜欢风先生的字，在建这个园子时，想请风先生题写园名。但风先生总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脱。徐宝山知道风先生嗜酒，便心生一计，请他到园子里喝酒。当风先生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徐宝山便提出为其写副对联“清风徐来，春色满園”，其中暗含了“徐”“園”二字。风先生因为醉酒，提笔就写，刚写完上联“清风徐来”四字行书，忽然一阵凉风吹过，酒醒了大半。他发现自己上了人家的套，于是将后四字“春色满園”改写成草书，想让徐宝山的计划落空。但徐宝山还是摘取其中两字用作园名。

后来有人告诉徐宝山，这“徐園”二字有问题：“徐”字中间一竖出头，是个错字；“園”字中间是个“虎”字，这不是说你徐老虎是笼中之虎吗？于是便向风先生兴师问罪。风先生也能自圆其说，称徐字出头，说明你不是人下之人，总有出头之日；至于圈中之虎，是说你在当地是一只猛虎，势力大啊！徐宝山听后点头称是，一场风波总算过去，这园门上的“徐園”二字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上述说法虽然颇为生动，但明显有编造之嫌，纰漏恰出在对“徐園”二字的解释上。因为“徐”字一竖出头是古人的习惯写法，并不是错字，只消查查《书法字典》便有了答案。



（东晋）王羲之　（唐）欧阳询　（唐）柳公权　（元）赵孟頫　（明）文徵明　（清）弘历

再看那个草书“園”字，中间是个“袁”，根本不是“虎”。风先生的“園”字写法直接取法于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二者的字形结构完全一致。只不过怀素分两笔，而风先生仅用了一笔写就，足见他的非凡之处。

“園”（吉亮工）　“園”（怀素）

之所以误认为“園”字中间是个“虎”，我想可能与徐宝山的绰号“徐老虎”有关，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是风先生咒死了徐宝山。另外，“徐”“園”二字揖让回顾，左右逢源，相得益彰，也不像是拼凑而成。

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位诗酒风流的风先生。

吉亮工（1857-1916年），字柱岑，别署莽先生。光绪十七年举人，但他无心仕进，不随俗流，清高自许，特立独行，言谈举止异于常人，故世人以“疯子”视之。遂自号“风先生”，款署“风风风”，并自撰《风先生传》云：“先生姓风氏，名风，字风风……然喜风，遇风辄狂笑，笑不止，即大哭。人见其哭笑无由也，怪之，以为有癫病。先生亦不辩也。”文后自赞曰：“人风我，我风人，不知我之为风与人之为风欤？须各有其真。”颇似能为青白眼的阮籍、“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之类的狂狷之士。

风先生好酒，他有一副自题联为：“座旁设酒随时饮，床上堆书信手拈。”徐宝山向其乞字，他题赠一联云：“从来名士惟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以自己的清高孤傲反衬一介武夫的好勇不识字。据《江都县新志》记载：“当光绪年间，扬州称狂士者三人。”风先生居首。

可幸的是，风先生尚存有一张非常珍贵的全身照，使我们得瞻其风采。但见他悠然兀立于菊花丛中，神采飘逸，眼空无物，若有所思。观其脑后无辫，当摄于民国初年，离其大去之期不远矣。

吉亮工资料照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